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評介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中的記憶》

A Review of Astrid Erll's Memory in Culture

doi:10.6752/JCS.201609_(23).0017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潘博成(Bocheng Pan)

頁數/Page：281-28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評介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中的記憶》

A Review of Astrid Erll's *Memory in Culture*

潘博成¹

Bocheng Pan

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是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英語文學與文化教授，專長於比較文學、文化史、文化記憶和敘事學等領域。其中，記憶研究是她著力頗深的領域，議題多圍繞一戰、西班牙內戰和越戰等事件展開，並陸續圍繞文化記憶、「旅行記憶」(travelling memory)、(文學)媒介與文化記憶以及如何跨文化／疆域地理解文化記憶等視野提出理論創見。上述研究旨趣亦投射在她的研究計畫，如「歐洲的跨文化記憶論述」及「跨文化記憶與移民：文學、電影和媒介中的社會生活」等。她學術服務經歷還包括SAGE出版社《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期刊、Palgrave出版社「記憶研究叢書」(*Memory Studies*)編委，《文化記憶研究讀本：跨國與跨學科手冊》(*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和《文化記憶理論讀本》主編等。

本書《文化中的記憶》(*Memory in Culture*)是埃爾2011年再版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英譯本，翻譯工作由東德小說研究者薩拉·揚(Sara B. young)完成。為何要在此時向中文讀者評介此書？作為一位初涉集體記憶研究的年輕學徒，我無法親歷上世紀70年代的「記憶熱」，卻置身於當代華人社會或東亞區域的記憶熱。這是評介此書的緣起。近三年來，兩岸學界相繼譯出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弗朗西絲·葉芝(Frances A. Yates, 1899-1981)、簡·阿斯曼(Jan Assmann)與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等名家經典。外加2000年前後譯出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和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等學者著述，使廣義的集體記憶（含社會記憶和文化記憶等）的主流理論在中文語境已有較多呈現。

投稿日期：2016年04月23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年07月21日。

1 潘博成，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電子信箱：pbc314@gmail.com

與翻譯熱相當，近年華人學者在歷史學（尤其是文化史、社會史與城市史）、文學與比較文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等學門，均產出了一些以集體（文化／社會）記憶作為方法、理論框架或研究對象的著述。這些著述常聚焦：東亞問題（如韓戰、釣魚島、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與當代議題）、邊緣或特殊群體（如老兵、華人新村、災民等）、地景與空間（如城市意象、紀念物、歷史古跡和社區等）、文化再現形式（王安憶、張愛玲等作家作品、城市輿圖與城市圖等）。這些研究趨向與本書關聯甚多，在理論、方法乃至議題擇取上皆有可對談之處。

本書引言指出「記憶研究」是不分國別與學科的當代重要議題，而本書討論之焦點在如何理論化文化記憶並使之為學界所用。第二章設題精妙，以「文化記憶的發明」為題簡約回溯自莫里斯·哈布瓦赫、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 1866-1929)、皮埃爾·諾拉，到簡·阿斯曼與阿萊達·阿斯的曼的記憶研究簡史。第三章綜述記憶研究的（跨）學科格局，主要涉足歷史學與社會學、藝術學與文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前三章可視作為一部「埃爾版」記憶研究教科書，適合相關領域讀者作入門讀本，第四章後則是埃爾對文化記憶的創見。在第四章，一套符號學範式重新爬梳了記憶與文化的關係，這是作者對記憶理論框架長久思考之結果。第五、六兩章是上述思考的遞進討論，分別由媒介和文學闡述記憶研究的歷史與前景。結語暢想了記憶研究在1920年代哈布瓦赫主導的第一階段以及1980年代諾拉等人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後的出路，跨文化、跨國、跨學科以及直面當下是可能取徑。最後，本書長達26頁的參考書目堪稱記憶研究地圖。

本書評第一部分詳細總結埃爾如何透過文化與媒介，繼續釐清記憶研究概念。第二部分則從學術貢獻、問題與討論兩方面做出若干評述。最後一部分返身華人和東亞社會，具體談談如何在此脈絡延伸討論文化記憶。

一、文化記憶如何涉入「記憶研究」？

長久以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凡談及「記憶」，指涉對象通常為哈布瓦赫以降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學術傳統。但集體記憶的模糊、氾濫與無法釐清等問題亦與之相影隨行。我們所說的究竟是集體的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是集合的記憶(collected memory)？如何理解記憶中的「群體」，它

是個體記憶的總和（或最大公約數）？又存在某種超越群體的集體記憶嗎？爲此，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認知層面的記憶與社會文化層面的記憶、集體記憶和集合的記憶等諸多二元關係組合被持續辨析。但記憶研究似乎依舊充斥著含混與模糊的現狀，促使包括埃爾在內的學者們尋求新的思考取徑。

埃爾並未直接繼承集體記憶觀念，轉而以德國記憶研究傳統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²作爲總體概念發展記憶研究框架。此著認爲「文化記憶統合了文化和記憶所有可能的表達關係，……文化記憶因此可廣泛地定義爲所有生物的、媒介的和社會的過程之總和，它們包含於社會文化脈絡下過去與現在的相互作用之中。」(Erl 2011: 101) 哈布瓦赫等學者被置於「後台」而成爲記憶學術史的一部分，被哈布瓦赫忽視的媒介尤其是文學媒介，則被上升爲論證主軸。

藉助人類學與符號學邏輯以及敘事學的轉喻和隱喻概念，記憶一方面是「個體與認知層面」的集合記憶，另一方面是「集體、社會和媒介層面」的集體記憶。前者實現並實踐了後者，後者形塑了前者。特別地，集合記憶並非是心理學意義的「個體記憶」，而是社會文化脈絡下個體的記住(remembering)過程。文化記憶統合了上述兩種記憶(Erl 2011: 98-99)：個體層面的是「『文化的』記憶」(“cultural” memory)，是一種轉喻，「記憶」是一種廣布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影響個體的文化現象。集體層面作爲「文化的『記憶』」(cultural “memory”)便是一種隱喻，文化即是記憶。若說前者的重點在文化，則後者聚焦的便是記憶。

簡言之，「文化記憶」包括「『文化的』記憶」與「文化的『記憶』」，前者是遊走在社會文化脈絡的個體記憶，後者的記憶類似於社會文化宏觀結構。這套框架可分爲物質、社會和精神以分別討論，又可結合心理學進一步細分。³

至此，問題焦點變爲如何使個體層面與集體層面連結？媒介（尤其是文化媒介）是關鍵所在。不誇張地說，書名*Memory in Culture*也能改爲*Memory in “(Cultural) Media”*。沿著物質—社會層面以及集體—個體層面兩組結構，記憶研究的媒介得以細分。這套「媒體框架」的路徑借鑑了阿斯曼夫婦的「文化記憶」概念與哈布瓦赫的「社會框架」。不同於聚焦在當下框架如何影響人們理解過

2 此書爲避免出現混淆，凡埃爾所稱之「文化記憶」採用“cultural memory”，簡·阿斯基曼的「文化記憶」則爲“Cultural Memory”。

3 關於這部分討論，亦可參見埃爾在《文化記憶研究讀本：跨國與跨學科手冊》所作序言〈文化記憶研究：介紹〉(“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去，媒介框架認為媒介成為溝通個體層面「『文化的』記憶」與集體層面「文化的『記憶』」的橋樑，而一套預中介化(premediation)框架為未來設定了劇本。

文學作品是埃爾重點關懷的媒介框架。文學與記憶的交叉展現在凝縮(condensation)、敘述和體裁三個層次，它與其他媒介相異之處在虛構性、內在彌散性(interdiscursivity)、多面向關聯性(polyvalence)和記憶的生產或反射等層次。這些層次亦可沿循文化記憶框架由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兩個層次，既可以文化文本作為貯藏媒介，也可作為「集體文本與未來的文學作品」。埃爾探索1920年代一戰文學作品和記憶文化後指出，文學敘述在當時便成為人們集體記憶的關鍵媒介，它的框架提供了關於一戰的某些具有歷時性的記憶形象，且兼具反思功能。各方圍繞著文本所進行的記憶競爭以及當事人的回憶與國族記憶的矛盾，將記憶文化推向了多面性，使之成為集體一個體，文化—記憶和物質—社會—精神相混雜疊合的文本記憶場(2012: 247-257)。

基於對記憶研究的省思，埃爾以文化記憶為總體概念，透過轉喻的「『文化的』記憶」與隱喻的「文化的『記憶』」，循著個體層次與集體層次的互動，由物質、社會與精神三個面向建立文化記憶理論。文化媒介意義重要，以媒介框架的形式影響著當下如何理解過去以及未來如何理解現在。

二、若與埃爾再對談：文化／國界、學科與當代

跨文化、跨國、跨學科以及直面當下記憶議題，是埃爾對記憶研究的前瞻。文化記憶框架界定與具體案例分析均融通了以上基本判斷，此著貢獻之一或是在此創見。以記憶場(*lieu de mémoire*)實踐為例，法國之後，德國、日本和美國陸續仿效出版了本國著述，但跨越國境的著述卻是稀見。目前廣受引用者僅有LeRider et al. (2002)以歐洲為視角的記憶場研究。埃爾敏銳意識到，雖然記憶研究方興未艾，但如何跨越文化與國家疆域，使記憶研究推向更寬廣的場域卻待深入實踐。文化記憶的再提出，或提出一種差別於簡·阿斯曼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框架，原因之一便是嘗試構思一種超越國族的論述框架，使被國族框架切割的記憶重新集結。

跨學科已非記憶研究領域之新議題，埃爾與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主編的《文化記憶研究讀本：跨國與跨學科手冊》(*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2008)已將「跨學科」作

為副標題了。但本書所指之「跨學科」絕非機械式地羅列涉足記憶研究之學科，或僅僅融通集體記憶波及的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本書賦予心理學與精神分析極為重要的地位，將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 memory)和程序記憶(procedure memory)與文化記憶的個體層面和集體層面融合，形成了個體層面下的「集合的情節（與自傳式）系統」、「集合的語義系統」和「集合的程序系統」，以及集體層面下的「集體的語義系統」、「集體的自傳式系統」和「集體的程序系統」，從而完成了個體的認知系統分別與轉喻的「『文化的』記憶」與隱喻的「文化的『記憶』」的連結。廣義地說，這打破了認為心理學和精神分析重視個體記憶卻與集體記憶相二元對立的一貫格局。

此書大量引述新近研究成果，體現作者對當代記憶問題的掌握。911事件是遍及全書的一個案例。關於該事件的記憶研究早已從美國延漫到全球，成為一樁跨國記憶議題(Erll 2011: 2)。埃爾反復暗示讀者記憶研究不單是朝向過去的議題，它也能持續詮釋變動中的當代，甚至為這個瞬息萬變的亂世提供一些方案。

但「跨文化、跨國、跨學科以及直面當下正在發生的記憶議題」依然有若干問題期待共同商榷，亦盼求教於讀者。跨文化與跨國究竟是以記憶研究見長與否為標準跨越，還是真正嘗試跨越與連結更多國家和文化的記憶呢？通讀全書，埃爾似乎更多聚焦在前者，在開篇文章(Erll 2011: 10-12)，記憶研究按國別狀況被細緻爬梳，這本無可厚非。但在之後行文，甚至關於跨文化與跨國的分析與案例展示中，都始終圍繞著英、美、德等記憶研究強國展開，恐怕有失偏頗。其次，跨學科既是記憶研究的一種思想取徑，也是方法論問題。當我們談論「跨學科」時，不僅僅是考量學科如何疊加，還涉及到學科間的融通問題。在有限的篇幅裡，埃爾當然無法細緻論述相關方法論問題，但我們可由各自領域進一步探索。譬如，口述歷史被界定在個體層面(Erll 2011: 99)，如何與這一層次的社會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結合，又如何與集體層面的社會學、歷史學或文化研究結合？這些集體層面的學科如何形塑個體層面的口述歷史，而口述歷史又如何實現集體層面的文化記憶？學者在口述歷史實踐常面對一個棘手問題：哪些敘述是個體經驗，哪些來自於集體層面的形塑。基於埃爾的框架，還可追問這些個體生命經驗來自何種媒介，如何得以塑造，或考察個體層面與集體層面之間社會文化脈絡的異同，從而為口述歷史實踐與材料分析提供更多方法。

三、文化記憶還可如何思考華人社會與東亞社會？

作為長期生活在東亞社會的華人學徒，筆者期盼置此著於自身生活地域、學術脈絡乃至生命經驗，在地化地重新驗證理論，促成理論與東亞或華人社會對話。

這場對話首先可從兩場戰爭談起：二戰（抗日戰爭）與韓戰（朝鮮戰爭）。兩場戰爭的記憶，長久以來都是牽動東亞內部關係的敏感地帶。譬如，教科書便是糾纏已久的歷史和當代問題。從日本教科書「南京大屠殺」之爭，到臺灣歷史教科書「日治」或「日據」之爭，再到中國大陸教科書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等問題，始終都在進行而未曾有行將結束或和解的跡象。不同世代的史觀難免因教科書差異而呈現多樣格局，縱使人們因閱歷增長能不斷習得新的資訊，但教科書教育仍然容易成為人們體認與詮釋歷史問題的貯藏媒介。由媒介框架論之，可視之為「教科書框架」。它不僅影響某個世代如何理解過去，也使他們反復使用此預中介化框架解釋還未發生的未來之事。再如，針對韓戰的歷史記憶研究，可嘗試從文學文本著手：中國大陸對朝鮮戰爭的英雄敘事、臺灣因韓戰而幸運解除危機的書寫、美國日後對戰爭的反思重估乃至當代隨著檔案開放，中國大陸出現的對朝鮮戰爭重新書寫的文學影視作品等。多面性與富有競爭張力的文化記憶在此縱橫交錯，一方面集體記憶，即某種韓戰的記憶文化可從文學作品中全面窺探，另一方面當時或當代社會文化脈絡的集合記憶也成為受眾各異記住過程的結構。由此，方法論上文學文本分析與歷史或社會研究也有了匯流之空間。但需要注意的是，埃爾論述較多的都是文學作品，甚至是有成為經典(Canon)趨勢的文學巨著。但近年來上述戰爭記憶領域出現了大量「抗日劇」和「諜匪劇」等通俗文化作品。它們與大眾日常生活的連結度較之於文學作品更為密切，它們應如何理解，似乎埃爾未能提供解決方案。筆者以為，藉助傳播學等學科的受眾分析或許是一解決方向，這也是埃爾框架較為缺乏的一部分。受眾分析可展現出民衆日常文化生活、戰爭敘事乃至文化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與默契，這對整合集合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並整體勾勒文化記憶具有可行性。

同時，我們亦可返身中國（含大陸與港澳臺）內部重新檢視文化記憶的其他分析。從宏觀層面而言，Marc Matten(2012)已主編了一部華人記憶場著述，涉及圓明園、中正紀念堂、延安和秦始皇兵馬俑等案例。透過這些案例，我們得以像諾拉書寫法國一樣觀看中國記憶場。文化記憶理論或還可將之再推

進一步：香港宋王台、臺北中正紀念堂以及北京圓明園，都廣泛牽涉到區域乃至國際關係。這些關係並非是「過去式」而是「正在進行式」，不僅僅發生在原場地，亦再現於其他地點。如圓明園十二生肖銅首複製品被香港藝人成龍捐予故宮南院所引發的「文化統戰」論爭，臺北中正紀念堂更名、存廢以及大陸遊客對兩蔣的理解，都可借用跨文化和邊界的文化記憶延伸討論。比方說，不少中國大陸遊客都會留下大量關於中正紀念堂衛兵交接儀式的旅行書寫和影像。能否透過文化記憶，考察這些媒介背後映射的記憶政治議題。大陸遊客對衛兵交接儀式的書寫，如何呈現他們關於威權時代臺灣、兩岸政治關係分合乃至的理解，亦或衛兵的男性形象被大陸遊客想象為臺灣時尚或陽剛的一面？若將上述媒介與臺灣乃至外國遊客進行跨文化或國界比較，能否形成其他觀點？

對於中國大陸內部，透過文化記憶或可討論文化斷層或社會斷裂的問題。諸如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文化傳統割裂，或當代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農民工或打工青年等個體所創作的「打工文學」，或都可以接著文化記憶下集合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層面繼續思考。斷層或斷裂之下，文學等文化媒介如何反映出人們記憶文化的斷裂或延續？顯然，這些議題不僅在回應當代或歷史，對它們的分析也將成為我們未來進行思考的衆多原點之一。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阿斯特莉特·埃爾著，呂欣譯。2012。〈20世紀20年代文學作品和記憶文化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收錄於《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頁247-25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外文書目

Erll, Astrid and Ansgar Nünning. 2011.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Le Rider, Jacques, Moritz Csáky, and Monika Sommer. 2002. *Transnationale Gedächtnisorte in Zentraleuropa*. Innsbruck: StudienVerlag.

Matten, Marc Andre. ed. 2012.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